

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体系



编者按

作为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关键支柱,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日益成为焦点话题。国内学术界围绕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模式与发展方向存在诸多争议,尤其在培养模式、研究对象和方法、知识产出等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期“学术圆桌”就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知识体系建立展开讨论,以期将相关问题的探索推向深入。

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转型

◇杨成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在“新文科”“多语种+”等理念下开展了基于自身学科传统和比较优势的初步探索。然而,相较于经济学等成熟的传统学科,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未形成普遍认可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其中,作为学科建设关键要素的区域国别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以及具有较高共识的通专兼具的“T”字形知识结构这一认知的合理性是否充分等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显然,厘清这些关键问题,是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区域国别人才的前提和基础。

“T”字形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

一段时间以来,区域国别人才普遍被认为应该是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三通”人才。从更简约的视角看,“三通”实际上要求区域国别人才既通晓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法律、军事等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还要对上述众多领域中的特定领域或特定领域内的某些甚至是某个特定议题,具有其他专家学者较难企及的类似“冷门绝学”的深刻理解。因此,不少专家学者将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概括为“T”字形刚性能力结构。应该说,这一类型学描述有其合理性,抓住了区域国别人才通专兼备、以专为先的基本特征。但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不足之处似乎也同样明显。

类似经济学上的分工越细则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斯密动力”,一旦学术成为一门专业和职业,日益细化的学科分工也必然会导致促进更高效的“知识生产”,因而专情于特定领域、特定议题的专家必然成为普遍现象。但学问上的专家,并不意味着对其所属学科的其他领域和议题一无所知,没有广谱性的理解和认知。恰恰相反,成为狭义上的专家的前提是首先拥有广义上更多知识的学者,以至于在当下的中文语境中专家和学者常常连用或互相替换。换言之,通专兼备实际上是对所有学科研究的从业人员的共同要求,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学科

的单一属性。因此,区域国别人才如何界定其身份边界、知识结构及能力体系,需要新视角下的新思考。

服务国家是区域国别学的最大特色

在笔者看来,学科是中国高校组织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个发展环节的绝对中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学科目录调整的主要驱动力即是来自国家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每个学科都不例外。问题在于,不同学科和国家需求的结合度并不完全一致,“自上而下”的学科自主发展和“自上而下”的学科顶层设计在不同学科上的均衡度差异明显。交叉学科门类下新设的七个学科,无一例外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国家对于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的战略期许。在此意义上,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利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美国等主要大国比中国系统性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早很多年。从概念来看,美国1947—1953年创建的 area studies 只见区域不见国别。与之相比,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边疆地区兴起的边政学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波“国际问题研究”浪潮,都蕴含着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国家主权的高度认可及遵循。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充分表明区域国别学和其他传统学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服务国家的特性。就其本质而言,区域国别学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应用性基础学科。

区域国别人才的知识结构要素

基于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特性,其人才必须首先是“国之干才”。舍此,学问再好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国家在国际失序日益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孜孜以求的战略社会科学大家。

第一,区域国别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知识高度,即以国家为中心服务国家利益、满足国家需求,而非纯知识探究,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

能确保区域国别人才首先是党和国家中心主义的人才。从能力素养建构的视角看,这也意味着区域国别人才必须首先具备更坚定、更纯粹、更深刻的政治定力,“懂政治”“服政治”“讲政治”是区域国别人才区别于其他学科人才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区域国别人才同时必须和其他学科的人才一样,兼具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既是特定国家和区域的“万事通”,又是特定领域和议题的“专家”。

第二,区域国别人才还必须做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大功能互为支撑的“一专双能”,二者不能偏废。对于正在稳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建立在扎实基础研究根基上的富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决策咨询服务,是国家更为重视的功能。如果说学术在中文语境中既包含着反映在知识体系上的“学”,又涵盖了折射在应用效能上的“术”两大层面的话,区域国别人才必须同时擅长“学”和“术”,必须把“讲政治的学术研究”和“有学术的政策研究”有机且精巧地结合起来。区域国别人才最高境界,是在坚持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在“将心比心”“文明互鉴”的理念指引下,不仅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为全球和区域治理及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层面上确保战略支撑。

此外,正如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指出的,区域国别人才应以“政治定力”为中心,建构起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三位一体的能力体系。对此,笔者的理解是,区域国别人才首先应具有“多语能力”,即熟练掌握英语及一至两门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的通用语言。其次,区域国别人才应具有“学科能力”,即能拥有扎实的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基础知识。区域国别人才提升学科能力,在中国语境下一定要注意避免重宏观、轻中观微观研究的痼疾,在保有战略思维的基础上于精细化上下功夫。有必要在知识高度为本、知识广度为器、知识深度为根的辩证思维中获得对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可靠理解。最后,区域国别人才应具有“话语能力”,原则上应具有在研究对象国长期学习、研究及实地调研的经历,争取前往区域与国别

研究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国际机构开展学习交流,在国际田野实践中提升全球理解力、全球表达力和跨文化沟通力。

具体而言,区域国别人才的话语能力实际上对应着两种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启后功能。一方面,区域国别人才应通过国内主流媒体向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民众及时提供一手、专业、丰富的评论文章,引导国内民众更好地理解我国对外战略布局及具体的多边外交、国际组织、热点问题等重大问题,使海外民众增进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并化为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区域国别人才应发挥已有国际合作网络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舆论场域积极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最终为中国解决有话不会说、有理说不清的国际传播难题和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贡献力量。

总而言之,国家急需的区域国别人才应该是聚焦特定区域和国家、基于问题导向、兼具知识高度(“国之干才”)、知识广度(通才)、知识深度(专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专双能的“三通”高层次特殊战略人才。在政治定力、多语能力、学科能力和话语能力(“四力”)的加持下,区域国别人才可以呈现向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向外瞄准国际竞争主战场、向前盯紧时代前沿领域的战略社会科学家。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决定了区域国别人才不是英文字母“T”字形,而是汉字的“杰”字形。与彰显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的“T”相比,“杰”的上半部分代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知识高度和所有学科人才都必须兼顾的知识广度与知识深度,以及区域国别学特色更鲜明的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两大功能,下半部分的四点则代表着实现一专双能的支撑性“四力”能力体系。综合各种因素看,在认知层面上,从所有学科共有的“T”字形上升到区域国别学专属的“杰”字形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综合体,是实现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转型的关键所在。而这又是尽快建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三种人才模式

◇贾烈英

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域外之学。随着中外力量的消长,中外组织单元的变迁,中国人看域外的世界观透镜也一变再变。如果我们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立体地观察区域国别人才,可能会看到一幅不一样的画面,因为他们角色不同,彼此关系位置不同,贡献的知识产品也不一样。国际关系学者、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秦亚青认为,就知识体系的构成而言,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这里笔者借用他的三类知识分类的框架,基于历史整理归纳区域国别研究的三种知识贡献模式及其相关流派。

第一种是描述性知识及其贡献者,即社会派。社会派人才主要是指来自民间的、自发的从事跨国交往的人士,包括跨国商人、旅游者等人群。他们不一定都能成为专家,但他们是文化的搬运工,其中的佼佼者确实证明了“高手在民间”。他们之所以对域外知识如此了解,动力源或是信仰,或是好奇,或是牟利,或是生存,或是爱恨情仇。正因为有朴素的真情实感流露,他们才能融入异国他乡,获取了部分域外知识,甚至比一般的外国人在某些领域更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个人的执着与自律,这类人才与其说是培养的,不如说是靠实践成长起来的。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就指出,学术人才靠自己成长,而非靠他人培养。培养并非成才的充要条件,如果将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考虑进来,培养甚至都不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社会派的经典代表人物,比如唐代高僧玄奘。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

带回大小乘佛教教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他带回了大量的域外知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基因,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

国外这方面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马可·波罗、利玛窦、阿倍仲麻吕、埃德加·斯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17年,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荣昌盛,激起了欧洲人向东看的热潮。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据此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第二种是学理性知识及其提供者,即学院派。学院派人才主要是指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等群体的知识理论家。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教师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的学理性知识,来自历史的传承,他们的强项在于逻辑严谨、方法多样、理论创新。学理性知识着眼于发现规律、真相、意义,不断丰富人类的知识宝藏,助力于人类间的相互理解。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都在区域国别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高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科研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为区域国别知识的积累辛勤耕作。区域国别学既是大国之学,也是大学之学。

目前,教育部共建设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中心450余家,涉及近200所院校,共有专职研究人员

18000余名,实现了对主要大国、重点国家地区、“关键小国”的精准覆盖。从院校分布看,现有的450余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中,综合性大学占比约为40%,沿边、沿疆、沿海地区高校占比约40%,外语类院校占比约30%,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整体学科优势,沿边、沿疆、沿海高校区位优势和外语类院校的多语种优势。同时,在财经、政法、水利、地质、能源、交通等行业特色院校也设立了系列培育基地、备案中心,有力支撑了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理性知识需要精雕细琢,千锤百炼,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应该给科研人员和学生们提供更为宽松的生活与学术环境,让长时段的思考催生灵光乍现的理论形成时刻。

第三种是应用性知识及其创造者,即政策派。政策派人才指的是国家间外交外事活动的实践者,包括政府间外交外事的各种渠道,比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上面描述的科研生活是一种理想的情境,更多的时候是形势不等人。社会派和学院派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都要服务于国家需要,服务于社会需求。当社会派、学院派提供的知识不足以经世致用时,我们就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政策派身上。

政策派生活在国家间交往的一线,是各种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所以他们是国家意志与政策行为的实践者,这使得他们必须综合考虑各种条件,提前预判对方的各种态度和国内群体的各种反应,当然他们也会受到自身角色、知识结构、经验和胆识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是政策派在任期间,如何最大程度地在同行中发挥领军作用,比如强化各种业务培

训机制,增加公务员的数量和扩大各种实习生的数量。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无论是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张骞,还是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奠基人周恩来,其贡献的应用性知识都是不可估量的。二是政策派卸任后,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育人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北京语言大学自2016年推出“大使看世界”高端讲坛,已经举办了近30次。正是他们的现身使得课本上的外交理论活了起来,使学生们的视野广了起来。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交官走进工厂、走进社会,让更多的受众习得域外知识,全方位了解中国外交。

当然,如何在机制上、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有效发挥这一群体的作用,还需要一个整体设计。

总体上看,三种知识生产模式、三类人才都非常重要,彼此互为补充。这当中开放多元的理念尤其重要,如何促进三类人才的相互加持,三类知识之间的相互赋能,这才是我们应该重点思考的核心所在。首先是坚持对外开放,让更多人走出国门,拥抱世界,夯实域外知识的民间基础;其次是完善区域国别学的顶层设计,允许有条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结合自己的特长,建设交叉学科,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并鼓励与国外合作培养区域国别人才;最后是鼓励人才流动、知识共享,营造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学术繁荣的春天。只要我们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域外知识一定会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

◇王健

日前,教育部提出了区域国别学科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就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因此,要统筹发挥好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的“三位一体”作用,紧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复合型人才。

学科交叉融合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属性

区域国别学是学科交叉,也是交叉学科。其特殊的研究对象、丰富的研究内容、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多样的研究方法路径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各学科对国家、地区研究的知识积累,聚焦于某区域、某国别,形成多学科的研究合力,推动综合性、集成性、对策性成果落地;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学科交叉只是交叉学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不等于交叉学科。事实上,当前国内和国际问题日益联系密切,国际问题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强,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学科也已开始采取学科交叉的跨学科和综合性研究路径。因此,区域国别学必须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

为此,区域国别学要以交叉性议题为切入点,打通原来分属于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依托动态分析、数据模型等创新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在现有学科各自边界之外的空白处涌现出新的知识,生成出新的知识体系,从而形成独特的交叉学科。这才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和独特价值所在,因为以往的单一学科或者多学科综合已经无法有效认识和应对复杂深刻的外部环境。面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唯有运用区域国别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知识,才能有效认识和判断这些变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未来走向,打破以往单一学科和物理式组合的跨学科研究具有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通过化学式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对外部世界的全新知识体系,从而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推进对外工作。

人才培养要树立交叉融合的学科意识

有鉴于此,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一定始终要有交叉融合的学科意识和理论自觉。在相关学科建设中,将其贯彻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培养方案的全过程,切实避免不同专业课程的简单拼凑。

要紧紧围绕地区模块、语言模块、专业模块三大模块组织相关课程,推动学科交叉课程建设。同时,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需要一个学科成长和成熟过程,在探索阶段,可以考虑借鉴其他交叉学科,特别是比较成熟的交叉学科的做法,确立交叉学科的基本规定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开展学科建设试点,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 and 学术体系。在课程教学方面,可以通过集体备课制度,从而避免课程拼盘现象,以交叉性议题为基础,设计课程体系和科研训练,逐渐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通过学科群的建立,立足交叉学科方向,推动学科边界的跨越、淡化和打破,最终走向各学科渗透融合。目前,许多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经验。例如,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以学科融合和高强度的田野实践为人才培养核心能力,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生态学和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视角开展发展中国家研究,力求突破传统地区研究路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清华区域国别研究”。

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

区域国别学复合型创新人才是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实现路径。

第一,区域国别学复合型创新人才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和学术功底,又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咨政能力,同时具备交叉学科思维和视野。为此,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方面,培养目标应该是语言能力+专业功底+问题(政策)意识+交叉思维,具体做法就是从各一级学科中,选拔语言能力出众、专业水平扎实的本科生,围绕区域和国别的某个问题,通过研究生阶段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能力培养,使之在已有专业基础上,通过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初步成为区域国别实际问题的通才。

第二,区域国别学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更多体现交叉学科能力的训练,用好学科交叉融合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催化剂”作用。交叉融合具有跨学科性、创新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区域国别学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要与智库建设紧密联系,不断开拓培养模式。例如,要加大以探究式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经常性举办学术前沿和跨学科研讨班,培养学生交叉学科视野和分析解决交叉性问题的能力;决策咨询也要纳入相关课程中。因为,设立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应对我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加强与外事务部门、国家高端智库甚至一些涉外企业的联系和合作,开展协同创新,推行导师组制度,在学术导师外聘请政策导师、企业导师等。

第四,要推动国际合作与交叉学科培养相结合,选派一些优秀学生,特别是非通用语种的研究生直接去对象国长期调研和生活,同时,聘请一些外籍教师、国际组织前雇员等参与人才培养。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仅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状、问题等信息,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新路径